

嫁入梁家的催化剂

家庭对于林徽因的影响，潜在而深远。从某种层面上，或许母亲何雪媛是林徽因嫁入梁家的催化剂。

1925年，林长民不幸死于战乱。通知林徽因这个坏消息的重任，很自然地落到了梁启超身上。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同赴美，在美国相互依靠，但就精神层面，梁思成未必能充分满足林徽因的内心渴望。她内心深处，一直为徐志摩而纠结。可林长民一去世，林徽因几乎变得毫无选择权。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这样写：

万一不行，消息若确，我也无法用别的活动解她，但你可以将我的话告诉她：我和林叔的关系，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今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

梁启超拍胸脯保证，是帮忙，也是束缚。即使林徽因在感情上有更多的想法，也只能是“结婚大吉”，梁家的帮助，除了以身相许，她似乎无以为报。更何况，林徽因经济上尚未独立，她还有母亲需要赡养。

对于突如其来的打击，何雪媛定然也是手足无措。她一辈子靠别人吃饭，在儿女婚事上，也便丧失了发言权。梁启超问她有什么话需要转告林徽因，她只说：“没有。只盼望徽因安命，自己保养身体，此时不必回国。”安命，何雪媛一辈子做得最多的，就是“安命”二字。

但即便是安命，何雪媛常常还是会有些恼人的小挣扎。程桂林的儿子林恒，从福建上北平投考清华，寄住在姐姐林徽因家。林徽因真诚坦率，对弟弟林恒照顾有加。但何雪媛却过不了心里那道坎，一有机会，便因鸡毛蒜皮的小事，跟林恒闹不愉快。

林徽因与何雪媛(下)

——新式“小棉袄”和旧式的母亲

◆ 伊北



◀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结婚

▶ 林徽因和父亲林长民



无声的存在

何雪媛的心态，虽然有点小扭曲，但也完全可以理解：她不是对林恒不满，而是对林恒的母亲程桂林在林家的顺遂耿耿于怀。她心里不免暗暗念叨：凭什么她就这么顺，养了儿子，得了婆婆喜欢，霸占了长民。现在，她儿子又来到我们家揩油了。凭什么，凭什么！可是，这到底不是她的家。这是梁家，新式的、开明的梁家。她的委屈和小脾气，大部分时候，派不上用场。她多少有些像张爱玲小说《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扭曲的欲望、无尽的哀伤。她的恨，也只是因为没得到爱。

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说：最近三天我自己的妈妈把我赶进了人间地狱。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头一天我就发现我的妈妈有些没气力。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晚上

就寝的时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 不幸之中。

1937年，抗战爆发。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孩子和何雪媛这位老妈妈，辗转南下。苦日子无穷无尽地扑过来。林徽因忍受着、抗争着，在贫穷、病痛和精神的消磨中度日。

在四川李庄，林徽因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几乎被熬干。可即便如此，何雪媛与林徽因的摩擦，也没有因为苦难而减少。林徽因说：

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用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用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用人像

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吩咐，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帽和自找苦吃。

林徽因的一生中，跟父亲林长民的合照不少，尤其1920年左右在伦敦时期，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林徽因和父亲是父女，也是朋友。相片中，他们的眉宇、神情是那么相似，眼神中都透着一丝真，林长民穿着西装，林徽因一身旗袍，颈项上挂着一个吊坠，清丽自然。哪怕是不了解的人，看了也能猜出个大概，说一句：哦，他们是父女俩。

和母亲何雪媛却不是这样。我们几乎看不到林徽因和何雪媛的合照。在林徽因的世界里，何雪媛是一个无声的存在。父亲和母亲，给予林徽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父亲的世界里，有海洋，有邮轮，有罗山名迹，有雨湖烟雾，有英语，有钢

琴，有新式的学校，有各类高雅的朋友……而母亲的世界带给她的，只有庭院上面一方窄窄的天。

通过争吵表达爱

林徽因爱母亲，但又有些看不起她。她们终究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何雪媛的孤独与寂寞，林徽因不懂，也不想懂。何雪媛偶尔想找一些小事，借以进入林徽因的世界。但林徽因决然一转身，把精神世界的大门关闭了。她们之间有爱，多少年相依为命，是那种不可缺少的、外人无法理解的爱……遗憾的是，她们之间的爱，似乎只有通过争吵，才能表达出来。

何雪媛大半辈子都是跟着林徽因过。1955年，林徽因因病去世，她便跟女婿梁思成一起生活。后来，梁思成再娶，她也依旧是丈母娘，跟女婿同一屋檐下过日子。再后来，梁思成也去世了，林洙便接过担子，负责照顾何雪媛的起居。周总理听说林徽因母亲健在，安排每月补贴何老太太生活费五十元。

到了“文革”，红卫兵来抄家，在箱子底抄出一把刻有“蒋中正赠”的短剑，那是林恒的遗物，林徽因珍藏，没想到到兜兜转转，连累到何老太太。当年，她不予他方便，如今，他的遗物给了她不大不小的惩罚。何雪媛作何感想？她和程桂林，是一生的对手，她只不过是刁难了程桂林的儿子几下，老天爷就如此惩罚她。眼泪过后，唯有苦笑。

何雪媛的一生，是“近乎无事的悲哀”，她总是默默地，躲在别人背后，发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却时不时地闹出一些脾气，制造一些不愉快——她也许只是缺少爱。在别人的背影里，何雪媛静静地活着，时光之水，悄悄地从她身边流过，寂寂的。她甚至还没能觉察，那水流便已经漫过头顶，一不小心，淹没了她，磨平了它。

摘自《名人传记》2016年第1期

一生一首翰墨诗——周慧珺传

李静 张亚圣

十六、结识伯乐

送别了沈尹默和拱德邻两位大家前辈，周慧珺迎来了人生中的另一位伯乐——翁闾运先生。翁闾运(1912—2006)的大名早在青年宫时周慧珺就已经熟知，他的滔滔不绝给周慧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翁先生原籍浙江杭州，故居西湖翁家山。其父翁有成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迁居苏州，博学精诗，著有《南峰诗草》四卷行世。翁闾运是家中幼子，早年丧母，父亲一人担两责，对于翁氏教导甚严，训勉甚勤。翁有成守持了清人好碑的特点，在翁闾运十岁时令其临习颜真卿《颜家庙碑》，并以颜氏的其人其事教他做人。此后，翁闾运对颜字情有独钟，愈发废寝忘食地临池，直至深夜。曾作诗：“鲁公铁书可摧坚，不畏艰难更向前。我学公书非好事，立身正直仰先贤。”成年后，翁闾运尝试读帖，读帖时间渐多于临池。对于墓志碑铭无所不涉，尤其是名碑古帖常向人借观。眼界日阔，阅历愈深，遂而复工欧赵。翁闾运少时读书极勤，中学时进入了省重点江苏省省立苏州中学读书，课余反复练字。

在习书之余，翁闾运还善工诗文，曾拜于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曾为周父编撰《竹径草堂记》)的门下。而翁闾运国学根基可谓深湛，曾作诗咏文天下面首，大都写就于“文革”浩劫时，情寄于诗借以自慰。翁闾运从“牛棚”里出来后，每天仍要去画院上班。翁氏家住吴淞路，要坐15路换21路，因而每日都得经过周慧珺家。对于周慧珺，翁闾运记忆犹新，这个学生不仅书法基础打得好，而且造诣高、天赋好，很早就已经留心了。于是，翁闾运常常吃完中饭，趁着换车的机会到周家主动上门赐教书法。第一次上门时着实将周慧珺吓了一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当时的周慧珺恰恰需要名师指教，虽则她已部分摆脱临摹的局限，开始寻找新的感应点，但总是遇到瓶颈，翁先生的出现犹如雨后甘霖，不期而遇。尤其是翁闾运家藏有许多名家碑帖，都是



绝好的善本佳作，总会捎带一些到周慧珺家供其读临。

正是从那时起，周慧珺对翁先生就抱有一份感恩、一份敬重，对翁老的感情是很深的。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直到2006年翁老西归时，翁闾运和周慧珺还保持着每周切磋书艺、谈古论道的习惯。可以说，翁老就是周慧珺书学思想的直接灌输者和启导者。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策之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而能通其意，则千里马有之。翁老这个良师益友确是周慧珺书学指点迷津的伯乐。

上世纪六十年代，谢稚柳在周总理和陈毅市长的授意下，以上海文管会的名义回购征收了许多流散于私人人家的书画遗迹，其中翁老就负责书法方面的鉴定，谢稚柳本人负责绘画方面的甄别。例如，有颜真卿第一全本国宝之美誉的宋拓《李玄靖碑》正是翁老仔细斟酌，拍板确认为真迹的，现存于上海博物馆。这种鉴定能力的高超展现其实都和翁闾运深厚的家学渊源和国学涵养密不可分。

在周慧珺家窄小的厨房里，周慧珺经常接受着翁闾运的指导与帮助，犹如奔泉渴驷，苦练真书。尤其是翁闾运深厚的诗文功底更是让周慧珺别开眼界，每每在学书闲暇时念谈诗文。念得久了，翁闾运就会摇头晃脑，带着长长的唱腔，好似古人般咏怀抒情。翁闾运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话多好动。在青年宫教书时周慧珺就是被翁闾运的滔滔不绝所吸引，现在是切身体会到了翁氏的能言会道，交谈时往往容不得自己插口。甚至连平时已经沉默寡言的周志醒也忍不住苦笑，苦叹翁氏说话的功力。

此外还有件趣事。周慧珺和家中的二姐都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幸好有一位金医生是周家的旧友，时常会到周家为他们推拿治疗，久而久之也识得了翁闾运。这位金医生虽是医生但却目不识丁，有点“江湖医生”的味道。长得倒是清秀白净，举止彬彬有礼，尤其是两双眼眸炯炯有神。一次看见翁闾运又在那张声绘色地说着什么时，他偷偷地对周慧珺说：“你看他那瘦小的样，活蹦乱跳的像个猴儿，和我比起来谁更像知识分子啊？谁更有文化啊？怎么看也是我更有文化嘛！”说得周慧珺哈哈大笑。

3.林则徐虎门销毁鸦片

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办理禁烟事务；又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和两广巡抚怡良协助林则徐进行一切。林则徐于1839年1月8日离开北京，3月10日到达广州，首先调查鸦片贸易和官商勾结走私的实际情形，并与邓廷桢、怡良等人会商对策。最能了解中国官场情形的英国领事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以为林则徐也和一般贪污官员一样，惯用“虎头蛇尾”的方法诈取贿赂，因此他暂往澳门观望风色；他没有料到林则徐是一个特殊的官员，抱有禁绝鸦片的最大决心。

当林则徐还没有对禁烟运动采取直接行动以前，广州的空气已显得十分紧张。若干久居广州的英国鸦片商人畏罪逃离中国；停泊在伶仃岛海面上的英国鸦片趸船二十二只(每只存贮鸦片一千箱上下)，也企图开船暂避，但被林则徐派广东水师制止。

3月18日，林则徐传集广州十三洋行商人，令他们转知外商，限在三日内，将趸船存贮鸦片实数具报，并全部缴出。3月19日，又下令不许外商离广州前往澳门。查理义律见事态严重，匆匆由澳门赶回广州处理。等到3月22日三天期届满，英商只肯缴出鸦片一千余箱，林则徐认为数目太少，就下令停止与英人通商，派兵严密包围商馆，封锁对外交通，并断绝食物供给。这时英国在广东沿海没有多大兵力，查理义律要想抗拒也不可能，只得向林则徐屈服，答应缴出鸦片全部。但查理义律不让英商把鸦片直接缴交清朝官员，而要英商把鸦片缴给他，由他以英国领事的资格出具收据，英商凭收据可在印度回收鸦片，或向本国国库领取价款。这样一来，本来是英商的鸦片就变为英国政府的鸦片，而鸦片问题的交涉也变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交涉了。

查理义律于3月27日正式具禀，负责缴出鸦片二万零二百余箱，共值银一千余万两。林则徐当即允许恢复供给英人食物，并定鸦片缴足二分之一时恢复对外交通，缴足四分之三时恢复贸易，完全缴清时一切照

常。计自4月11日林则徐亲到虎门验缴鸦片起，直到5月21日才完全缴毕。林则徐并向道光帝请准，凡外商缴出鸦片一箱，赏给茶叶五斤。

这里应该附带提到的是，当时在广州经营鸦片贸易的，除了英商以外，还有美国、荷兰等国商人。当林则徐令外商限期缴出鸦片时，美、荷等国领事具禀声明他们未有存烟，请求照常贸易，但林则徐坚持要全体外商共同负责，批驳不准。实际当时美商存有鸦片一千五百箱，美国领事士诺(Peter Snow)只推说这些鸦片是英商托他们代销的，并已交还给英国领事查理义律一并交出；林则徐信他不过，士诺只得把查理义律的收烟字据呈交作证，才算了事。还有居留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原也有经营鸦片贸易的，经林则徐令当地官员查明确实未有存烟，才不再追究。

英商缴出鸦片二万零二百箱后，本拟全部解送北京复验，嗣后因为路程太远，运输不便，决定改为就地销毁。当时择定虎门海滩高处，开挖两池，池内放置盐卤，先把鸦片投入盐卤中浸泡半日，再抛下整块石灰，使盐卤沸腾起来，鸦片立刻随着石灰溶化，剩下的烟灰等物，等退潮时候引潮水送出大海。计自6月3日开始销毁鸦片起，林则徐和广东地方官员轮流到场稽查，直到6月25日销毁完毕为止。

林则徐销毁鸦片这一伟大行动，显示了中国民族纯洁的道德心，一洗多年来贪污官员们所带给中国的耻辱；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第一次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决性；无怪当时各国商人都赶到现场参观，“表示畏服之诚”。连道光帝也认为是“大快人心一事”。6月3日应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的一个日子。

林则徐为要永远禁止鸦片输入，彻底消除烟毒，在3月18日令外商限期缴出鸦片同时，就要他们出具甘结，声明“以后商船进口，永远不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收，人即正法”。等到英商缴出鸦片后，4月4日林则徐再令查理义律从速具结，以后又曾数度催促，都被查理义律抗拒。

鸦片战争始末

司马牛

